

魏建国： 左手实体经济，右手虚拟经济



魏建国

■ 本报记者 蒋皓

他曾建议成立“大部委”，统管中国工业经济，是唯一一名从体制改革上为中国实体经济提出发展建议的前政府官员。他直言，“这个事情拖欠了不好”，实施过程中要注意效率。谈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微妙的关系，他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这就像一个人的左右手，左手是实体经济，右手是虚拟经济。一只手完不成事情，必须两只手才能共同把工作做得更好。”

他就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中国企业报》记者对他进行了独家专访。

《中国企业报》：现在一些舆论把实体经济跟虚拟经济分得很开，这样就造成了对立的局面，我们有没有必要把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搞得这么泾渭分明呢？

魏建国：按照世界经济的发展规

律，这两种经济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应该说虚拟经济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反之，实体经济又支持了虚拟经济的发展。我个人认为这像一个人的左右手，左手是实体经济，右手是虚拟经济。一只手完不成事情，必须两只手才能共同把工作做得更好。

这个道理西方很多年前就认识到了，但是西方也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太功利主义了。一旦实体经济赚钱的时候，就拼命发展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发展完了以后，又觉得虚拟经济更来钱。实际上，无论作为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甚至作为一个政治家、国家领导人，都必须把这两方面分配好。中国实体经济为什么能做的好？我认为就是要扎扎实实做好一件事情，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实体经济。

《中国企业报》：我发现一些做实业做得很棒的企业家一直对虚拟经济“想入非非”，例如万达的老总王健林，他曾说过“如果派他去管银行会管的很好”，这说明了什么？

魏建国：金融业务实业家也不是说就不能做，打个美国不太恰当的比方，美国有一个体操高手或武林高手，他在规定动作完成之后，还要做一些高难度的动作“炫技”。高难度动作有可能是虚假的，有可能是危险的，但是一失手，它掉下来了，你能因为这个高难度动作失误就否定它的基本动作吗？现在有人就觉得，中国这个基本动作要做好，高难度动作更要做好。我觉得不能这样走，我们还是要走的忠厚一点，细一点。

中国的金融到底该怎么支持？中国自己也没有探讨出来，我们应该更深入的学习西方，同时要走中国特色的路子。这是我们虚拟经济应该发展

的方向，而不能说我们只要实体经济不要虚拟经济。

我刚才讲左右手的功能，一个人要发展，成为一个技术全面、心灵手巧的能匠，光是靠一只手、独臂是不行的，不管左手还是右手。我认为这个比喻切合中国当前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

《中国企业报》：对，您曾说过中国跟德国的情况很像。能否详细谈谈？

魏建国：有一个陪同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的德国教授跟我说过，他研究后发现，跟中国在世界上最相像的国家就是德国。例如，两个国家都是注重发展实体经济、都很注重出口、两国都有大量的贸易顺差……我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

德国外交部国务部长迈克尔·林克曾说：“欧债危机必须要靠欧洲实体经济解决，今后德国也绝对不放弃实体经济。”当前世界，不仅仅是德国的领导人认识到了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就连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也是深知这一点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一再强调要让实体经济回归，并屡次对一些发展重心在海外的美国大公司进行游说。除了欧美强国，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对发展实体经济的认识和紧迫感也比我们更加强烈。巴西、俄罗斯、墨西哥最近都出台了很多关于加强实体经济、促进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

我们有不少专家和学者都对未来必须要发展实体经济的信心不够充足，总以为我们无论怎样发展，都不会赶上其他发达国家。我们与其自怨自艾，还不如把更多的精力都投入到去寻找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切入点上。

十八大指出，我们国家下一步要

着力发展我们的实体经济。这一精神切中了我们当前经济发展的要害，并指明了国家未来发展的战略方向。

《中国企业报》：您曾提出成立“大部委”统管实体经济，目前实施得如何？

魏建国：这个事情拖欠了不好。虽然我不知道现在成立了几个小组，但是我觉得现在中央重视了，一定很快。我相信这个比较得民心，这是个大事。中央一定会抓紧，而且也会分步骤实施的，而不是全部摊开。

政府的办事效益要提高，更好地促进政府办实事，在这样的情况下，减少扯皮，减少推诿，减少腐败，这是关键。这也是改变我们工作作风，提高办事效率，贯彻为企业服务、为人民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一个重要环节。

并不像别人说的成立大部委，内部协调、部门利益会矛盾重重，我相信中央一定会把这些问题考虑得非常细，非常透。像你们办的《中国企业报》，每期这么多版怎么弄？关键是版面要协调好，要一致。所以，成立“大部委”也是一个道理，大家一致的情况下才能提高效率，为老百姓办事情。现在的机遇好，咱们节奏得明快。中国发展已经到了这个阶段，这个阶段不是一种粗放式的，而是精细的，而且要考虑长远。

此外，部委的工作风貌，不应该疲于应付的。现在一些部委工作的同志，一天干下来很累，“很熬人”的感觉，工作中也是被动的多、应付的多，而不是从宏观、战略上考虑事情。目前还存在“管理得多，服务得少”的现象，因此，在政策制定的时候也要创新，尽量避免类似情况。

加快国地税合并 推进税制改革

(上接第一版)同时,对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也进行调整,使广义财权、事权的划分改革同步推进。2013年房产税改革试点扩大的可能性很大,在这一逻辑下,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分成关系和财力事权分配关系都将面临重构。

如果改革更为全面,更为彻底,就要对1994年以来的分税制格局提出新的改革要求,先由中央全部“统”起来,再大幅度地“分”给地方,最终做到财权事权统一。这也是上层乐于看到的局面,先统后分,途径不一样,但最终效果可能是一致的。

从“强中央”到“富国穷民”

绕不过去的是1993年来的分税制改革。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央财政已非常拮据,不得不靠大量发行货币来解困,因此带来的通货膨胀危机让人不寒而栗。当时连某些中央机关都已经到了“不借钱工资发不出去”的境地。鉴于前所未有的“弱中央”状态,朱镕基采纳经济学家董辅初等人的提议,决定“分灶吃饭”——中央与每一个省份磋商分税种类和比例,实行分税制。为了说服各省,朱镕基在随后的两个多月里,奔波于全国说服,期间颇多拉锯、妥协。结果大变,仅仅几年时间,到朱镕基交班时,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7.5%,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为55%,比改革前的1993年提高33个百分点;2002年,除税收返还和体制性补助外,中央性地方转移支付高达4019亿元,是1995年的8.6倍,年均增长36%。

然而,在分税制接下来近20年的运行过程中,这个体制框架在发挥出一系列正面效应的同时,逐渐显露了积累了一些问题。分税制改革后,一方面中央把财权高度集中,在税收上削弱地方政府所占的比重,而留给地方的几乎都是收入来源不稳定、税源分散、征管难度大、征收成本高的中小税种。另一方面中央又把更多的事权层层下放给地方政府,甚至经常以牺牲地方税权为代价来完成中央的某些政策,“中央请客地方买单”的现象大量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日子越来越难过。他们要以45%左右的收入办80%左右的事。怎么办?两种办法:一种是把矛盾大量转嫁到老百姓特别是占人口大多数的省份身上;一种是卖土地,2010年土地财政收入上涨到65%左右。结果是富国穷县、穷镇,老百姓越来越穷。

分税制改革不深化带来四大弊端

我们要两方面看问题:在分税制运行近20年中,既要总结经验,更要直面存在和出现的各类问题。因此,深化及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便是国家当前面对的一个十分重要和紧迫需要解决的课题。

当前我国分税制存在下列弊端:

首先,分税制改革没有做到事权与财权的科学统一,中央政府税收比重过高,地方政府缺乏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汲取能力。绝大多数地方政府将增加财政收入的目光投向土地开发方面,导致土地价格不断上涨,房价也不断上涨。

其次,分税制改革增加了增值税,并且从生产环节设计增值税具体规则,一方面有可能加大企业负担,一方面又出现了大量的税收征管漏洞。

第三,分税制改革重点在征税比例划分,而没有考虑到公共产品投入的需要,这就导致我国在公共产品配置方面出现了严重的权利义务不对称现象。由于事权与财权划分不科学,导致中央政府在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的宏观调控始终难以发挥作用。也就是说,中央政府的钱没有用好。

第四,分税制改革是以1993年各地经济总量为基础确定分税比例的,没有充分征求各地意见,更没有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广泛讨论,在程序上存在问题。

建议全国人大制定税收法典

经过近20年的磨合之后,重新审视我国的分税制改革,我们认为应该进行调查,在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尽快拿出一套顶层设计。今年全国两会肯定会大讲小康,大讲民生,显然更多的是意愿的表达。最实际、最根本的做法是财权事权统一,缓解地方政府压力,缓解基层矛盾,让老百姓富起来。在这件事情上,政府部门是不易办好的,全国人大应该多发挥作用,最终的结果肯定是通过制定税收法典,改变这种临时性的、不正常、不规范的税收体制。

从世界各国税收制度的发展进程来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税收分配应属于宪法解决的问题。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中央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征税比例,情有可原,但是如果长期坚持这样的税收制度,那么就会带来诸多弊端。

分税制的改革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不是增值税与营业税的对立,也不是国税地税的矛盾,更不是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博弈,而是财权事权的统一,是国富民富的统一,这才是公平正义,才是法制,才是人民的小康梦。

全国两会很快就要召开了,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从今年两会起,将分税制改革提上议事日程,通过税制改革的顶层计划,再通过制定税收法典,改变目前这种不均衡的税收分配体制。

2013：企业的困境与突围之道

■ 杨卫泽

2013年,中国经济形势会更好,还是更坏?中国经济是否面临困境,将迎来哪些机遇,又将面临哪些挑战?

我们提出突围这个词,是说明我们现在的经济处在某种困境中,要摆脱这个困境,这是我们在较长时期认识形势的前提;认清突破困境的思路,是未来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基本问题,是摆在企业面前的最大难题;明确“突围之道”是企业迫切需要的一种精神和行动,也是取得更大成就的基础。

国际经济形势对我国企业发展形成长期困局

2011年初,很多中小企业已经逐渐陷入困境,仅从2012年温州的银监会公开公布的一个数据看,当地企业破产停产超过了60%,中小企业尤其困难,中国企业仍然处在困境中。这个大的格局没有改变。

我们的困境不仅在于短期,而在于长期,在于世界这个大背景是一个困境。综观2012年,全球经济“哀声”一片,2013年,这种状态还将持续。现在的美国实体经济并没有多少改观,国内消费需求增长的后劲不足,而美国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火车头动力不足,世界经济增长必将乏力。南欧经济出现衰退,北欧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欧洲经济可能长期陷入低迷。日本更是债务严重,内需不足和人口老龄化,加上最近一段时间,又频频在领土主权上同邻近国家闹事,更是缩减了其市场空间,加速了其经济衰退的趋势。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家由于受到国际经济不景气和国内因素的影响

,在金融危机后也出现了动力不足,经济下行的压力。原来发展劲头很足的巴西经济非常糟糕。印度、俄罗斯、南非这些所谓的金砖国家也都黯然失色。整体看,2013年世界经济困境将会在以下方面对我国企业发展形成挑战。

一是低速增长将成为全球经济的新常态,我国企业发展难以获得突破。经济增长非常缓慢,失业率非常高的局面使得中国企业投资的回报率不高,投资风险巨大。从出口来看,国际经济形势没有好转,人家不要,我们什么也出不去,出口有待于国际形势的好转。

二是围绕市场的争夺将越来越激烈,我国有些企业已经严重受阻。围绕着市场争夺,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明显抬头,有的假借国家安全、环境影响等理由,阻止国外商品的进入,以保护本国生产商,我国有些企业已经成为受害者。

三是货币滥发现象将日益严重,我国货币面临着进一步升值的趋势,企业利润将进一步被压缩。各个发达国家经济体,为了刺激本国经济增长,制造假象繁荣和对外转嫁内部经济困难,纷纷实行货币宽松政策。货币超发将成为2013年国际经济回避不了的一个词语。出口困难将进一步加大,依靠出口带动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将面临着被“剪羊毛”的风险。

四是新技术革命正处在孕育期,我国企业面临同台竞争的劣势。当今世界科技正处于新一轮革命性变革的拂晓,一些重要的科技领域将发生革命性突破已经初显端倪。我国企业在新技术革命的动向前,不进则退。

国内经济形势 对企业发展的困境

我们的困境不仅在于世界范围,更在于国内背景的困境。多年来,我国经济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增长,受到全球市场低迷的影响,出口受挫,我国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虽然,我国发展仍然具备难得的机遇和有利条件,但是发展仍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仍然突出,整体上很难突破。

一是我国经济增长阶段开始转换,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经济增长将回落到中速水平,简单依靠速度效益型增长模式将难以为继。在1978年到2010年32年间,我国经济保持年均9.9%的经济增长,被国际社会誉为“中国经济奇迹”。2012年,我国经济增速为7.8%,2013年,中央在综合考虑各种情况后,科学提出经济增长速为7.5%。经过30余年高速增长之后,我国经济基本面发生了变化,支撑经济增长基础性条件发生了变化,由此带来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我们将从10%高速增长阶段转入7%—8%中速增长阶段。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企业发展报告2013》,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国劳动力供求状况已悄然发生了变化,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的空间逐步缩小、进一步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潜力有所下降和东部发达省市增长明显回落所造成的。在现有的增长模式下,我国企业具有典型速度效益型的特征。如果经济增长回落到8%或更低水平,绝大多数的行业企业会感到很困难甚至会出现亏损。企业效

益下滑,必将波及财政收入和金融资产质量,从而引发系统性的财政金融风险。

二是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过快,利润空间不断被挤压,企业效益下降明显。造成当前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快速上升有四个方面的主要原因。一是大宗原材料价格上升,二是土地成本上涨,三是资金成本和人民币汇率升值,四是劳动力成本包含劳动保障支出增加。中国企业联合会2012年发布调查报告显示,许多企业反映,成本上涨过快已经超出了很多企业的承受能力。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实际上是意味着企业人工成本的上升。企业要消化生产经营成本的快速上升,就必须要不不断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和产品附加值。

三是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消化过剩产能和稳定就业之间存在着两难选择。2012年,除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造船等传统行业产能大量过剩外,氮肥、电石、氯碱、甲醇、塑料等一度热销的化工产品也因为产大于需而出现销售困难;铜、铝、铅锌冶炼等有色行业生产形势低迷,产能过剩问题凸显。甚至多晶硅、风电设备等新兴产业领域的产品也出现产能大量过剩,大型铸件也存在产能过剩的隐忧。产能过剩与经济增速下滑和出口减少密切相关,产能严重过剩,使企业资金严重积压,企业经济效益和再投资受到极大影响。同时,为消化过剩产能,就要关停一些工厂和生产线,但这样又会影

响就业,导致不稳定因素出现。企业陷入了两难境地。

(下转第六版)